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编辑出版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

CHINESE
PUBLISHING
HISTORY

中国出版史

下册·近现代卷

吴永贵 主编

吴永贵 本卷编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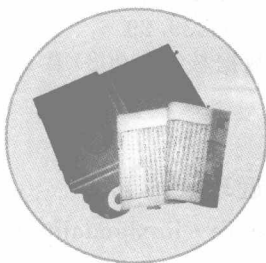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编辑出版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

中国出版史

下册·近现代卷

吴永贵 主编
吴永贵 本卷编著



编辑出版学专业核心课教材丛书顾问委员会

张小影 孙文科 范卫平 郝振省 张增顺 王建辉
朱建纲 陈锦涛

编辑出版学专业核心课教材丛书编辑委员会

谢新洲 张志强 李 频 徐建华 罗紫初 黄凯卿
方 卿 吴 平 黄先蓉 朱静雯 张美娟 王 清
姚永春 吴永贵 徐丽芳 王晓光

湖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以出版技术的变革为主要依据,将我国出版历史划分为雕版印刷术发明前的抄写复制时期、雕印刻制的版印时期、采用铅活字排版印刷的近现代出版时期。下册对我国近现代的印刷技术、版式装帧、编辑活动、经营管理、出版人物、书刊流传、出版文化等方面内容作了细致阐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出版史(下册·近现代卷)/吴永贵编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8

(编辑出版专业核心课程教材)

ISBN 978-7-81113-435-3

I. 中... II. 吴... III. ①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近代

—高等学校—教材 ②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现代

—高等学校—教材 IV. G23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6828 号

中国出版史(下册·近现代卷)

Zhongguo Chubanshi(xiace · jinxiandaijuan)

主 编: 吴永贵

本册编著: 吴永贵

责任编辑: 肖立生

装帧设计: 吴颖辉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 410082

电 话: 0731-8821691(发行部), 8712708(编辑部), 8821006(出版部)

传 真: 0731-8649312(发行部), 8822264(总编室)

电子邮箱: xls666@163.com

网 址: <http://press.hnu.cn>

印 装: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32 开 印张: 13

字数: 338 千

版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000 册

书号: ISBN 978-7-81113-435-3/G·359

定价: 55.0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目次

第三编 近现代印刷技术引进及应用时期

第一章	新印刷技术的引进与应用	003
第一节	石印技术的传入与推广	004
第二节	铅印技术主流地位的形成	008
第三节	我国印刷业的快速发展	012
第四节	新技术对图书装帧形态的影响	019
第二章	晚清时期出版业的近代化转型	025
第一节	教会出版与新式出版的开篇	026
第二节	洋务派译书与新式出版的官办	036
第三节	民营出版机构的崛起与新式出版主体地位的确立	043
第四节	出版业近代化转型的内外部因素	055
第五节	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出版中心	074
第三章	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发展历程	081
第一节	“五四”新思潮下的出版变革	082
第二节	民国出版业的黄金十年	094
第三节	抗战时期出版业的衰落与出版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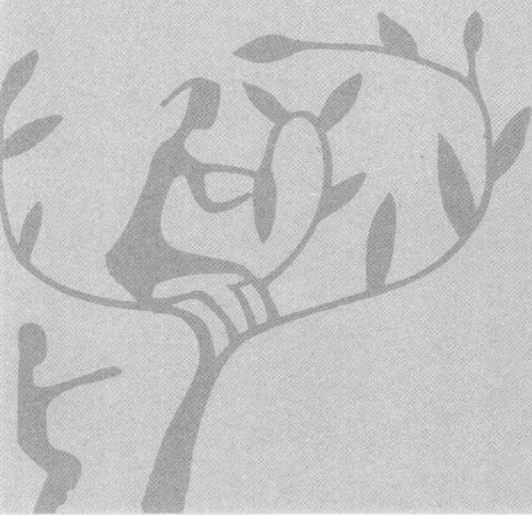
	文化努力	103
第四节	战后出版业的重建与挫折	117
第五节	民国时期的出版中心	123
第四章	民国时期重要出版机构	138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	139
第二节	世界书局、大东书局与正中书局	158
第三节	亚东图书馆与泰东图书馆	170
第四节	新潮社与北新书局	179
第五节	开明书店与文化生活出版社	190
第六节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与上海杂志公司	200
第七节	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与新知书店	212
第五章	民国时期重要出版人物	224
第一节	张元济与王云五	225
第二节	陆费逵与舒新城	235
第三节	章锡琛、夏丐尊与叶圣陶	248
第四节	邹韬奋与徐伯昕	260
第五节	沈知方与张静庐	268
第六节	鲁迅与巴金	276
第六章	民国时期出版经营活动	285
第一节	机构组织与人员构成	285
第二节	股份制与多种融资方式	297
第三节	编辑与发行活动	303
第四节	广告与书评	315
第五节	多种经营	323

第七章	出版法律与出版管理	328
第一节	《出版法》及其相关条例法规	329
第二节	书刊查禁与原稿审查	336
第三节	《著作权法》与版权纠纷	345
第四节	书业行业组织	356
第八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业	364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出版活动	364
第二节	苏区出版业	373
第三节	抗战时期根据地的出版业	377
第四节	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领导的出版活动	384
第五节	抗战胜利后解放区的出版事业	388
本卷参考文献		396
后 记		404

第三编

近现代印刷 技术引进及 应用时期

新印刷技术的引进与应用
晚清时期出版业的近代化转型
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发展历程
民国时期重要出版机构
民国时期重要出版人物
民国时期出版经营活动
出版法律与出版管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业



第一章 新印刷技术的引进与应用

以木版刻印为出版技术特征,以线装竖排为装订排版形式,以经史子集为主要出版内容的中国传统出版业,自唐代以降,千余年连绵不绝,在繁荣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促进世界文明进步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若不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古老中国在西方列强武力的冲击之下,被迫开始近代化之旅,传统的雕版印刷也许还会像往朝历代一样,波澜不惊地缓步前行。然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1842年8月清政府与侵略者签订的城下之盟,决定了中国社会再也不可能按照自己固有的方向继续发展,中国古老的传统出版也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中,开启了行业变革的历史新途。

技术是最活跃的出版生产力要素。正如唐代雕版印刷的发明,曾为中国古代出版业的发展,注入了最为强大的动力因子一样,近代出版变革的新质,也是从西方近代印刷技术的引进和应用中,拉开了与传统出版的距离,并最终取代了传统出版的地位,而成为出版主流。机械动力代替了手工方式,平版、凸版、凹版、孔版等多种印刷手段,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运用到具体的出版物生产中,显示了技术对出版的强大拉动力。

由于石印技术和铅印技术在近代出版史上的特殊影响,本章特将它们单列出来,分头叙述。

第一节 石印技术的传入与推广

石印技术是奥匈帝国人施内费尔德（Aloys Senefelder）发明的。据说，施氏爱作歌曲，但无力付印，乃试以石板印刷，屡试屡败，屡败屡试，终于在1796年试验成功，称石印术。其法以天然多微孔的石印石作版材，利用水油相拒的原理，用脂肪性的转写墨直接把图文描绘在石面上，或通过转写纸转印于石面，经过处理，即成印版。印刷时，先用水润湿版面，只有图文部分能附着油墨。

一、石印术的早期传入

石印术最早是由传教士带进中国的。传教士们为了传教的方便，需要印刷一些布道小册子。19世纪二三十年代，来华传教士不多，经费也十分有限，因此他们设法降低书籍的印刷成本，经过比较和讨论，认为石印最为便宜。

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是早期来华的著名传教士之一，同时也是一个技术出色的印刷工人。早在1820年，麦都思就身携印刷工具到达槟榔屿。次年，移至巴达维亚，从事传教工作，在1829~1835年间，他出版了28种自己撰写的中文布道书，大多为石印，其中1829年石印的《东西史记和合》，是现在所知最早的石印本中文书。^① 1832年，麦都思又在澳门、广州设立石印所。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麦都思到了上海，创设墨海书馆，曾石印书籍，为上海石印之创始。

二、石印术的一度鼎盛

石印技术虽然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传入中国，但真正得以普

^① 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装订源流和补遗》，第359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

及却在光绪年间。1876年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办了一个专门的石印印刷所，由一法国人和华人邱子昂主持其事，设备简陋，全靠人力，印刷相当吃力。1879年，善于经营的申报馆老板美查，设立点石斋印书局，聘请邱子昂为技师，使用转轮印刷机，配置引擎，印书效率大为提高。在点石斋的全盛时期，有石印全张机十多部，并在北京、浙江等地开设了20多个分店。

19世纪80年代初，又有同文书局和拜石山房的创立，成为与点石斋齐名的鼎足而三的三大石印书局。同文书局为寓沪广东人徐润兄弟创办，有石印机12部，雇工500人，规模之大，可以想见。它所石印的诸如《殿版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资治通鉴》《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巨著，都堪称为当时出版界的大手笔，而它在印刷这些大部头时所采用的股印办法，^①又开创了后来民国时期图书预约出版的先河，因而在近代出版史上，同文书局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有学者把同文书局列为我国近代私营出版业诞生的承先启后者之一，^②确有其史实上的依据。

在三家大书局带动下的石印技术，由上海而全国，迅速地得以传播和应用。据《贩书偶记》《中国丛书综录》《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书著录，从清末到民国，全国各地采用石印技术印书者多达上百家之众。^③各地石印书局所印书籍的种类包括常用古籍、

① 所谓股印，并非“招股合印”，而是出版者许以比定价优惠得多的价格，招人预订。对出版者来说，藉此可解决流动资金问题，又可判断具体印数，从而减少出版风险；对读者来说，可用较低的价格，获得自己想要的书籍。双方有利，因而这种方法，很快在出版界推广开来。股印是早期的叫法，到民国时期通常称之为“预约”，翻开《申报》《大公报》等报刊，出版者做这样的预约广告，屡见不鲜。

② 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第248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③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第456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

通俗小说、唱本、地图，乃至报刊登刊及新著之书等，但印得最多的还是各种科举用书。石印技术凭借着出版工序省、出书速度快、存貌不失真等巨大的生产力优势，后来者居上，一度成为近代出版的主导技术，时间长达二三十年之久。直到1906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才给那些以石印兔园册子为营生的众多石印书局，以致命性的打击，出版的存书乏人问津，兴盛一时的石印业几乎全军覆没。

三、石印术的潮起潮落

晚清石印出版业的潮起与潮落，主要归结于图书市场的起伏变化。当初点石斋石印《康熙字典》，因携带便利、价格低廉而为当年的举业之人大批购买，一印4万部，又一印6万部，获取的巨大商业利润和随之展现出来的巨大场屋用书市场，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大力跟进，甚至有些原本是从事雕版印刷的老书坊也见机行事，改弦更张。如出版业的百年老店——扫叶山房，据其刊印的《扫叶山房发行石印精本书籍目录》统计，先后石印的各种图书便多达419种。而到了20世纪初叶，在八国联军巨大打击下奄奄一息的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朝议多日的科举制度在“新政”中正式宣告废除。传统的读书人由此失去了借以飞黄腾达的敲门砖，而新起的石印业则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图书市场，石印出版由此走向衰落。再加上从光绪末年到辛亥前后，铅印技术逐步完备，铅印替代石印，成为印刷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石印术的余波再兴

但衰落并不等于被淘汰，石印作为一种出版技术本身依然有着应用的价值。随着辛亥以后兴学存古、保存国粹思潮的影响，古籍图书又有了新的市场需求。新形势下的古籍出版方式，除了传统的雕版刻印和新式的铅排铅印外，晚清时期用得惯熟的石印技术再一次因其影印传真的优点，而备受民国出版界的青睐。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珍本

初集》《续古逸丛书》《续藏经》《道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等古籍，都是将千方百计搜访得来的第一流版本，以影印的方式使之化身为千百，满足了追求版本价值的古籍研究者和公私藏书家的需要。商务印书馆在影印这些古籍过程中，为了使印出来的书看起来美观，使得那些宋元善本中当年刷印时就有的搭痕、溢墨、双影、墨眼等毛病，不至于出现在影印后的新书上，商务印书馆一方面继承了晚清时期同文书局首创的在石板上描润修改的办法，另一方面又陆续应用了“仿写”、“再落石”等新的方法予以技术上的处理，使得新印出来的古籍，既不失原有版本的风貌，又在审美效果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民国时期运用石印技术影印古籍的出版社不限于商务印书馆一家，世界书局、开明书店、中华书局、文明书局、佛学书局、会文堂书局、锦章图书局等多家新老出版机构都有涉足；影印的出版物范围也不局限于古籍一类，各种碑帖、画册、地图、年历画、月份牌等多种类型的出版物亦利用石印技术。旧时我国未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翻印外文原版书不受限制，一些高校和出版机构利用石印的方法影印外文教材，因影印价格较原版书便宜而备受学生的欢迎。长沙方鸣皋留日归来后，曾于1920年研究西文原版书不经拍照直接落到石板上印刷的方法，上海龙门书局创办人严幼芝1930年也探索同一方法影印西书，轰动一时。^①

随着新的先进胶印技术的引进，民国时期原来的一些石印业务逐步被取代，但就全国来说，直至50年代还是胶印与石印并存。石印之所以在相当长时间内不被淘汰，是因为胶印机价格既高，橡皮布、锌皮等制版材料又依赖进口，高昂的制版成本导致了昂贵的胶印价格，当时一般要求不高的彩印品仍以石印合算，不同的产品用不同的印刷方法矛盾并不突出。在全国出版和印刷

① 范慕韩主编：《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第352页，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

中心上海，部分石印所改以胶印为主后，石印设备和业务仍保留了若干年。而全国其他中小城市，在 50 年代前仍以石印支撑局面。^①

第二节 铅印技术主流地位的形成

中国虽然很早发明金属铸造活字，但只有铜活字比较流行，锡活字和铅活字应用得很少。现代使用的凸版铅印技术是从西方传入的。

早在 18 世纪，法国汉学家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就开始了中文活字的研制工作，惜乎不克成功。随着 19 世纪上半叶欧洲与中国交往的增加，汉学研究高潮的兴起，主要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需要，在 19 世纪 30 至 50 年代，欧洲各地兴起了一股研制中文活字的热潮。

一、早期试验的几种汉字活字制造方法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是第一个来华的新教教士。1814 年马礼逊在东印度公司的支持下，延聘职业印刷工人汤姆斯（P. P. Thoms），在澳门与几个中国刻工在含锡的合金块（现在印刷行业称为“刻坯”）上雕刻汉字，速度很慢，也很麻烦。1815～1822 年之间，雕刻了两副大小不同的铅合金活字 20 万个以上，用于印刷马礼逊编的 6 卷本《华英字典》600 部，耗费 1.2 万英镑。这副汉字活字是用传统的雕刻方法制造出来的。

1834～1835 年，法国著名刻字工人葛兰德（M. c. Grand，又作 M. Marcellin Legrand）在汉学家波塞尔（M. Pauthier）的建议和指导下，从事铸造中文钢字工作，为减少字模的数量，葛氏将汉字的形旁、声旁分开雕刻铸造，用时拼合，称为“华文叠积

① 范慕韩主编：《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第 353～354 页。

字”、“叠积活字”，如用“石”、“宛”拼成“碗”，“鱼”、“秋”拼成“鳅”，石、宛、鱼、秋都刻在半颗活字上，这样所需字模，就少了许多。不能分开的字，则仍制作单字字模。1836年，这套字模被美国长老会买下，安置在澳门印刷所，后来被移到宁波，再移到上海。“华文叠积字”后因形体不一，且给排字工人麻烦不少，不久即废。

1827至1828年，伦敦会传教士戴尔（Samuel Dyer）在槟榔屿发明了另一种制造汉字活字的方法。他利用木刻雕板，浇铸铅板，再锯成一个个铅字活字。他后来到马六甲，又不断对制造方法加以改进。他改用先雕钢模，然后冲制铜字模，再制汉字活字。这样铸造出来的活字美观、耐用。到1843年10月21日在澳门去世为止，他制成1845副汉字大字字模冲头，以及一批小字冲头。这副字模后为美国长老会所得。这一制造汉字活字的方法，被沿用到1859年。

二、姜别利创制电镀中文字模

姜别利（William Gamble），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出身于爱尔兰的一个基督教家庭，17岁移居美国，在费城一家印刷公司当学徒，后去纽约从事《圣经》出版工作，1858年奉派来华，负责长老会设在宁波的印刷机构。姜别利鉴于汉字字体复杂，字数繁多，且雕刻阴文字模字体细小，镌刻困难，乃于1859年在宁波创制电镀字模。其法乃先用黄杨木做字坯镌刻反体阳文，再镀制紫铜阴文，然后将此紫铜正体阴文字模锯成单字，镶入黄铜壳子。这较之先前以手工刻模，大为省工，且字形完美，笔锋清晰，即使蝇头小字，也能雕刻。

此后，姜氏将汉字按照西文活字规格，制成七种不同大小的汉文活字，分别命名为：一号“显”字，二号“明”字，三号“中”字，四号“行”字，五号“解”字，六号“注”字，七号“珍”字。由于这七种汉文铅字的大小，分别等同于西文的七种

铅字，从而解决了中西文的混排问题。这种字模和铅字发明以后，美华书馆大量制造，出售给上海、北京等地报馆、书局，成为此后几十年中中国最通用的字模和铅字。人们称之为“美华字”，又俗称宋字。

姜别利于 1869 年应邀去日本，传播他的发明。他在日本造字模三副，一副汉字，一副英文，一副日文，大小字号齐备。他用这些字模，帮助日本排印了一部既用日文、又用英文的日英词典，然后重回中国。姜别利于 1871 年返回美国，在谢菲尔德学院学习，被耶鲁大学授予名誉文科硕士学位，1886 年在他的宾夕法尼亚农庄逝世。姜别利去世以后，他的美国朋友这样评价他的贡献：“在未来的一个世纪中，在中国或日本所发行的任何一本《圣经》、基督教书籍或科学书籍，都将带有姜别利先生的手纹。”^①

三、铅印技术主流百年

由于初期中文字模制作困难，字体少，字形结构欠美观，购置中文铅字和字模价格昂贵等方面的原因，铅印的使用范围并不广泛，仅局限于教会印书馆、少数资本雄厚的报馆及部分官书局。这也给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石印技术的大行其道，创造了机会。

随着姜别利电镀字模的创制，大小成套中文铅字的问世，以及浇铸铅字方式的屡经改进，从每小时仅能铸字数十枚的手拍铸字炉，到脚踏铸字炉和手摇铸字炉，速度增至每小时铸字七八百枚，铸字技术臻于成熟，价格成本大为下降。铅印复制版的制作工艺，从泥版而纸型，是一个巨大技术飞跃，不仅便于保存和再版，还可运至外地多地印刷，从而为书刊尤其是报纸的印刷创造

^① 麦金托什：《美国长老会书馆（美华书馆）纪事》，《出版史料》，1987 年第 4 期。

了良好条件。再加上多种大小幅面、不同结构的凸版印刷机的设计成功,照相金属凸版(铜锌板)的投入应用,铅印术显示了它巨大的生产力优势:文字容量大,再版方便,印刷速度快,阅读效果好,适应面广。

戊戌变法以后,随着各种政治力量舆论宣传的需要,随着清末废科举和各级学校的兴办,随着新的科技知识的传播,书刊出版量陡然大增。这就需要有大量的文字印刷能力作保障。依当时的技术条件,石印已不能适应这种需求,只有发展铅印一途。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铅印成本与石印相差无多时,铅印开始被民营出版印刷企业广泛应用,而成为我国出版技术的主流,一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统治中国近百年时间。

四、汉字排字架的改进

金属活字的大量使用,必然牵涉到汉字排字架的问题。如何设计出更加合理的排字架,以尽可能地提高功效、减少劳动损耗,同样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姜别利在印刷史上的另一个贡献,是创用了元宝式字架。汉字字数繁多,单《康熙字典》就收字四万七千多个,给检字排字带来很大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姜别利雇了两名中国学者,花了两年时间,将汉字按使用频率分为常用、备用、罕用三大类。他创造一种木架,正面置字24盒,装常用、备用铅字,两旁46盒,装罕用铅字。每类字均依《康熙字典》部首检字法分部排列。排工中立,就架取字,速度较以前至少提高3倍。这种字架,亦为各种报馆、书局广泛使用。

1909年,商务印书馆聘请了一批文字学家,经过反复研究和探索,调整了字的排列位置,把使用频率高的放在前面,罕见的放在后面。这种改进的字架大大提高了排字速度。1923年,商务印书馆监理张元济,鉴于排字工人终日站立,屈伸俯仰,甚是劳累,且字架占地太多等原因,研制了新的字架。拣字工人坐在轮